

從直選總統與民主化談政黨體系變遷： 歐洲國家的比較研究*

沈有忠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陳宥辰
東海大學政治學碩士

摘要

政黨政治向來為研究憲政運作、民主深化的核心議題。過往的研究，多將政黨政治視為影響憲政與民主的自變項，但憲政特性以及民主轉型的過程，也可能系統性的影響政黨體系，對於政黨體系變遷的規模、機率，存在一定的關連性。基於此，本文以政黨體系變遷為依變數，從制度特性以及民主化背景來觀察政黨體系變遷的特性。核心假設有三：首先，就制度特性而言，直選總統的國家，比起議會內閣制的國家，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較高、規模較大；第二，以選舉時程而言，也是制度面向的因素，在直選總統的國家中，同時選舉或蜜月選舉，因為總統衣尾效應較強，引起國會內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也較高。此外，因為小黨在總統選舉容易邊緣

* 本文討論政黨體系變遷，引用了國內學者徐火炎的分析。徐火炎教授是早期研究政黨體系凝結相關議題的學者。在撰稿與修訂過程中，徐火炎教授病逝，令人惋惜，也謹以此篇文章紀念並追悼徐火炎教授。

化，因此同時選舉或蜜月選舉下，小黨泡沫化的機率也較高；第三，非制度面向的部分，從民主化時程與轉型遺緒來看，歐洲國家中，後共轉型的新興民主，相較於歐洲中的老牌民主而言，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也較高。

關鍵詞：政黨體系變遷、直選總統、選舉時程、民主化、歐洲

* * *

壹、前言

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政黨政治的健全與否，直接關係到民主與憲政的穩定。而政黨的制度化、政黨體系變遷，則是討論政黨政治的重要子題之一。Lipset與Rokkan（1967）提出了政黨政治將直接影響民主轉型與發展，並且從社會分歧的特性來討論「政黨體系凝結」（freezing of party system）的概念。政黨政治既然對民主發展至關重要，探尋政黨體系變遷的原因，也是比較政治中，關於民主化研究、憲政體制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對此，本文擬以制度面、非制度面兩個層次，探究政黨體系變遷的相關議題。就制度面而言，檢驗總統直選、以及選舉時程等制度特性；就非制度的部分，則是探究民主化時程、歷史遺緒對政黨體系變遷的影響。

就制度面來說，政黨政治與憲政體制的相關研究，向來集中在從政黨政治解釋憲政運作的關連性，也就是視政黨政治為因，搭配憲政特性討論政府組成與憲政運作。然而，憲政體制的特殊性，也可能反過來，成為影響政黨政治發展的因素。Samuels（2002）使用了「總統化政黨」（presidentialized parties）一詞，指出總統個人因素，會影響與淡化政黨在組織形態、意識形態與政策、以及選戰中的角色。主要原因在於直選的實權總統，也就是在總統制或半總統制中，總統成為關乎政黨發展，甚至存亡的重要因素。當總統候選人個人特質實質影響政黨運作，可能導致的效應就包括：政治的個人化、意識形態因素的降低以及選戰中政黨組織遭到邊緣化的現象。Samuels與Shugart（2010）後續出版*Presidents, Parties, and Prime Ministers*一書，集中討論此一現象，成為從憲政特性推論政黨發展的重要研究。

就非制度面的部分，本文將分析民主化的過程，以及共產專政的歷史遺緒，對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以及民主化後政黨政治的發展的影響。一般而言，新興民主的市民社會與政黨政治的連結起步較晚，加上全球化後，社會分歧的議題可能跨越更多層次。因此，在社會分歧議題複雜、共產專政的歷史遺緒不利於社會組織、政黨政治發展的條件下，政黨體系變遷的頻率和幅度可能也較大。

在討論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鞏固時，政黨體系成爲重要的變數之一。Lipset（2001）指出，政黨體系的穩定，也就是社會分歧制度化的具體表現。整體而言，政黨政治的穩定與否，反映出民主運作與社會分歧的特性。再以臺灣爲例，隨著戒嚴的解除以及黨禁的開放，臺灣在1980年代末期，從威權統治展開民主轉型，解除黨禁使得政黨體系轉爲競爭性的多黨政治，開啓民主政治新的篇章。期間，1992年首次國會選舉、1996年首次總統選舉，以致於2000年在總統的職位上首度發生了政黨輪替，民主政治趨於鞏固。在這近30年的民主轉型與深化的過程中，政黨政治引起多重的討論，包括黨、政之間的關係、以及政黨體系的變遷等。其中總統的政黨角色與憲政定位，更屢屢引發爭議。例如總統是否適宜兼任黨主席，就直接指出了總統黨政關係的爭議性議題。可見政黨政治與憲政體制、民主深化等議題，在臺灣仍舊存在實務運作的爭議，而其中關注焦點便爲總統的憲政定位與政黨角色的界定。

在上述的論述當中，可看出總統與政黨的關係，實爲廣義「黨政關係」中的研究課題。而關於憲政體制與政黨體系的討論而言，經典的研究在於討論憲政體制與不同類型政黨體系搭配後的影響。關於不同類型的憲政體制是否與政黨體系的變遷也有關係？再從民主化的面向來看，新興民主的政黨體系是否較容易產生變遷？此類的討論相對較少。本文擬以此作爲核心假設，既然憲政體制系統性的影響政黨體系，那麼對於政黨體系變遷的規模、機率，也可能存在關連性。而新興民主基於社會組織的脆弱性，也可能有著較不穩定的政黨體系。本文的核心假設有三：首先，直選總統的國家，比起沒有直選總統的國家，發生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較高、規模較大；第二，就選舉時程而言，在直選總統的國家中，同時選舉或蜜月選舉，因爲總統衣尾效應較強，引起國會內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也較高。此外，因爲小黨在總統選舉容易邊緣化，因此同

時選舉或蜜月選舉下，小黨泡沫化的機率也較高；第三，本文以歐洲中的歐盟會員國為分析範圍，分成11個中、東歐的後共國家，以及16個西歐民主國家。這些國家中，以民主化時間來看，本文假設中、東歐的後共新興民主國家，受到共產遺緒的影響，將比位在西歐的老牌民主國家更容易出現政黨體系變遷的結果。簡單的來說，從歐洲國家經驗中，將可以看出制度的特性（直選總統與時程）與非制度的歷史遺緒（共產轉型的新興民主），將對政黨體系的穩定性產生顯著的影響。

在個案選取上，本文以歐洲中的歐盟會員國為範圍，分析中、東歐的11個後共國家，以及16個西歐國家。選擇這些國家的原因有三：第一，以歐盟來作為分析範圍的基本標準，其中包括11個有共產背景的新興民主，這一個群組可以控制歷史遺緒與轉型前政體的背景。其次，歐盟的27個個案，幾乎全為議會內閣制或半總統制，因此也能提供議會內閣制、半總統制的憲政差異之比較。¹第三，這些個案在比較的層次上，除了直選總統與否之外，也包含最基本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民主的年紀（新興與老牌民主）這兩項比較的層次。本文也會予以控制後討論直選總統在這兩組個案中的影響力。換言之，這樣的分組與交叉比對，可以凸顯出制度（直選總統）與歷史（共產轉型的新興民主）對政黨體系變遷的影響。在分析的時間上，本文選擇這些個案最近五屆的國會選舉，大多都是在21世紀之後。選擇近五屆的資料分析，主要的原因是為了避免新興民主在轉型初期，政黨政治必然不穩定，會影響分析的結果。因此在政黨政治發展一段時間後，觀察政黨體系與憲政差異的關連性，可以降低民主化初期政黨政治不穩定的背景因素。在前述個案與資料分布的時間內，本文進一步操作三個自變數：直選總統與否；是否為同時或蜜月選舉；民主化時間等，依變數則是政黨體系變遷的次數與衣尾效應的有無。關於變數的操作與界

¹ 直選總統可以說是總統制、議會內閣制、半總統制的分類標準之一。總統制和半總統制之下，都有直選總統的制度設計，議會內閣制則無。此外，半總統制的制度特性，還包括了內閣與國會的信任機制。亦即在制度上，除了有一個具有一定實權且直選的總統之外，還有一個對國會負責的總理與內閣，形成「二元行政」的特性。然而，總統的權力大小，在總統制國家以及半總統制國家則可能有不一樣的情況，仍須視具體的制度設計、甚至選後的府會一致性而定。以歐盟27個會員國來看，除了賽浦路斯是典型的總統制之外，其餘皆為議會內閣制，或廣義定義下的半總統制。

定，在下一段與研究假設一併提出。

貳、文獻回顧：憲政研究與政黨體系變遷

本文欲以憲政特性與民主化等因素，討論政黨體系的變遷。在過去關於憲政體制的研究中，基於行政、立法關係的比較，區分為總統制與議會內閣制。到了1990年以後，半總統制的個案增加，成為第三個被大量研究的憲政類型。研究半總統制極富盛名的Elgie（2005）曾對憲政研究的文獻趨勢提出三個波段的分析，討論了憲政體制、總統權力、政黨體系、甚至研究方法等相關研究的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研究趨勢中，關於憲政體制與政黨體系上的討論，傳統的研究多數集中在政黨體系對憲政體制運作的影響，亦即政黨體系為因，憲政運作穩定與否為果。然而，轉換因果關係後，不同類型的憲政體制是否影響政黨體系的形成與穩定也值得討論。而這類的研究或許有個案分析，但系統性與基礎理論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倘若憲政體制作為自變項，憲政體制中的特性必然也影響了政黨體系，亦即對於政黨體系變遷之規模、機率，也可能存在著關聯性。以下的文獻回顧，本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討論：第一，觀察憲政體制的研究趨勢以及主題；第二，政黨體系變遷的相關研究；以及第三、民主化程度與歷史遺緒的討論。

一、憲政研究與直選總統研究

憲政體制的相關研究，議題極為廣泛。首先，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配套思考，影響了政府的組成，是憲政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議題，例如吳文程（1994）、謝復生（1994）、林繼文（2006）等。而蘇子喬（2010）、蘇子喬與王業立（2018）則將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配套進行比較檢視，也討論了我國憲政運作的特性。這些研究大多是進行憲政體制與政黨體系的「配套研究」，而非對兩者之間系統性互為因果的變化進行分析。

與憲政體制搭配的，除了選舉制度、政黨體系之外，總統權力的影響是另一個在憲政框架下討論相當豐富的議題。Samuels提出的「總統化政黨」是相當具代表性的研究。Samuels指出，總統制的國家與議會制的國家，因應體制

差異，必然會發展出不同的政黨組織與行爲（Samuels 2002, 462）。在半總統制研究興起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所謂的「總統化政黨」指的是政黨相對於總統被邊緣化，政黨在包括政策與意識形態、組織以及選戰中的角色各方面呈現自主性降低，相對的政黨的領導人實質上即是總統，其自主性最高（陳宏銘 2009; Samuels 2002）。在此概念下，陳宏銘（2009）分析臺灣在2000~2008年間的總統化政黨現象，以總統是否兼任黨主席作為關注焦點，其發現總統無論是否兼任黨主席，實際上都是政黨實質上的領導人，總統政黨化是很明顯的趨勢。沈有忠（2012）也在半總統的框架下，討論憲政運作總統化的趨勢。指出總統掌握政黨、政黨掌握國會多數時，是總統化程度最高的類型。如同Elgie所言，總統化政黨的研究，是結合了憲政類型與政黨研究兩個子題，指出憲政體制的差異對於政黨組織與行爲必然產生影響（Elgie 2011, 394）。

在直選總統與政黨政治其他相關的研究中，也有不少文獻集中在透過政黨政治來觀察政府組成的類型，並進一步比較總統潛在的憲政權力、立法影響力等。Skach（2005）、Shen（2011）等研究，以政黨屬性為基礎，依據總統、總理、國會多數黨三者的一致性與否，區分憲政運作、府院會關係的類型。此外，張峻豪（2012）從府會關係、行政權歸屬以及總理負責對象等三個變數，區分八種二元行政的關係，也是從府院會在政黨的一致性來觀察憲政運作。前述文獻都凸顯出，政黨體系與憲政研究必然有緊密的關連性，而多數研究均是從政黨體系為因，憲政運作為果的架構作比較、類型化分析。最後，李鳳玉、黃建實（2015）亦針對總統兼任黨主席與否，比較了政府提案的通過率。而郝培芝（2013）則是將焦點置於半總統化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針對法國、臺灣以及俄國三個半總統制國家進行跨國比較，發現半總統制的總統化發展會強化總統主導內閣改組與更替的頻率，而當政黨體系朝向兩黨化（bipartisation）會更為強化內閣不穩定的現象。這類研究集中在總統的角色與政黨政治的關連性，和本文的關連性也相對較高，但可以發現，多數的文獻均討論政黨體系搭配憲政特性後的政府類型，或是分析政黨總統化的現象。較少以憲政特性去分析政黨體系變遷的問題。

二、政黨體系變遷研究

政黨體系變遷是一個較宏觀的議題，其中Key（1955; 1959）曾經提出「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的概念。Key對於美國選舉中政黨勢力消長研究中、指出政黨重組可分為兩種類型：「關鍵性重組」與「持續性重組」。前者代表的為明顯而大量的黨派投票改變，主要結果為在野黨擊敗執政黨，且於後幾次選舉中仍能維持勝選優勢；後者代表的為逐漸緩慢的黨派投票改變，即在每次的選舉結果之中，都會有少部分的選民從原先政黨轉投給另一政黨，在每一次的結果中，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改變政黨的勢力版圖。而Campbell et al.（1960）曾對選舉進行類型分析，研究美國歷次總統選舉有三個不同類型：維持性的、偏離性的及重組性的。其中重組性的選舉涉及基本的、持久的政黨忠誠的改變。由於Key對政黨重組的研究，關注的是一個持續性的現象，因此較為嚴謹的看待政黨重組，至少需要約30年的持續觀察。因此政黨重組的概念用來分析新興民主，可能需要更多經驗資料來佐證。雖然如此，政黨重組的概念，對本文分析之政黨體系變遷，在本質上有相當接近的意涵。

研究美國的政黨重組在學界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文獻。多數研究美國政黨重組的文獻，以地緣因素、性別差異、政黨傾向、族群政治（尤其黑人選民）解釋政黨認同與政黨重組（Miller 1991）。亦有以總統選舉的特性來討論政黨重組的若干特性。例如David Mayhew歸納了11個常見的主題，伴隨政黨重組的研究被提出。在關於選舉類型的部分，Mayhew就指出，政黨重組的發生，伴隨總統選舉比伴隨國會選舉更為常見（Mayhew 2000, 452, 458）。此外，發生政黨重組的關鍵性選舉，往往具有較高的投票率，而總統選舉有衝高投票率的效果，和政黨重組的發生也有關連性（Mayhew 2000, 462）。其他像是意識形態化的選舉、操作全國性議題的選舉，都比較容易引發政黨重組，而這樣的選舉也都比較常在總統選舉發生，而不是國會選舉。

James（2005）提出所謂的「恩庇式政黨」（patronage party）的概念，討論美國總統選舉對政黨組織的影響。²James指出，總統選舉具有發展恩庇式政

² 所謂的恩庇式政黨，指的是藉由實質利益的供輸，尤其是工作機會，例如政府公職、政黨職位、或其他可以由總統指派的職位，來換取在總統大選中的選票動員。

黨的條件，而恩庇式政黨容易將政黨的組織與制度和總統個人發展在一起，使得政黨對選民認同的競爭，從意識形態轉變成利益分配。Kopecky'則是針對後共地區新興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進行分析，指出多數新興民主國家的政黨具有「恩庇侍從主義」(patronage and clientelism)的特色。恩庇侍從主義的發展，主要的原因在於共產獨裁時期，禁止公民社會過多的自發性組織，使得政黨和社會的連結，多數建立在政治菁英的個人魅力或是物質利益之上，對於政黨發展現代化的組織體系而言，形成不利的因素(Kopecky' 2006, 258)。從這個角度推論，恩庇侍從的建立不利於政黨建立穩固的社會基礎，自然也比較容易出現政黨體系的變遷。

James與Kopecky'的觀察，提供本文重要的概念啟發。依據James對美國總統選舉的研究，發現總統選舉會改變政黨發展群眾基礎的邏輯。在傳統的政黨政治中，選民的政黨認同是依據意識形態、社會分歧、身分認同、階級宗教…等差異而支持特定政黨，但總統選舉發展出恩庇式政黨的模式，讓總統藉由職位分派而成爲選民與政黨之間建立認同的橋樑。而Kopecky'的研究更直接指出，恩庇侍從主義對於政黨與市民社會的連結來說，是一項不穩定的因子。政黨在社會的支持基礎是在個人或物質利益，這並不利於政黨制度化發展，政黨的社會基礎也較鬆動。結合兩位學者的研究，直選總統是恩庇式政黨發展的制度因素，而恩庇式政黨則是有利於出現政黨體系變遷的條件之一。

在臺灣，徐火炎(1992)的文章可謂爲我國較早討論「政黨重組」的文章，該文分析解嚴前後歷次選舉投票結果的政黨得票比率變化，發現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舉競爭中的勢力消長是呈現一種「持續性的政黨重組現象」。而游盈隆(1994)在其文章基礎下，指出政黨形象和意識形態一方面提供反對黨成長機會，另一方面也侷限了反對黨的壯大。此外，在政黨認同之外，還有四個因素爲探討政黨重組時需要加以重視的，包括「政黨形象」、「選舉議題」、「意識形態」、「社會分歧結構」。

嚴格說來，政黨重組可以視爲政黨體系變遷的一環，在學界或對美國的研究而言，有較嚴謹的定義。爲了避免與既有「政黨重組」相關研究的混淆，本文延伸了Lipset與Rokkan「政黨體系凝結」的情境，欲分析政黨體系低度制度化，短時間內容易出現變遷的現象，也就是以「政黨體系變遷」爲分析的

概念。從政黨體系凝結的概念，亦延伸出許多對新興民主的討論。例如Sitter（2002）就引用了政黨體系凝結的概念來比較東歐與西歐政黨體系變遷上的差異。但所使用的自變項一方面沿用了社會分歧，二方面加上了政黨發展的策略。Bertoa（2014）則是從政黨制度化的過程，來討論東歐國家政黨體系凝結的程度。臺灣的學者Shyu（2011），也是以政黨體系凝結的概念，分析了臺灣民主化後政黨體系發展的概況。這些研究都是延伸了政黨體系的凝結的概念，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中、東歐新興民主政黨發展的趨勢。

三、中、東歐新興民主的政治分析

將憲政體制進行類型化分析，在個案的挑選上，會篩選出一些同質性，討論這些同質性對憲政運作的影響。例如吳玉山（2012）就將全球半總統制區分為三個群組：西歐、後列寧、後殖民。並且在分類之後發現，西歐除了法國與芬蘭之外，其餘的半總統制都是準內閣制。後列寧國家中東歐多為妥協或準內閣，而前蘇聯則多是總統優越。最後在後殖民國家中，則是以總統優越為主。吳玉山的研究，後列寧、後殖民的概念，隱含了歷史遺緒對憲政運作的影響。本文承襲這樣的原則，希望能釐清中、東歐的後共國家，民主化度是否與政黨體系變遷也有關連性。

Millard（2004）研究歐洲後共國家的政黨與選舉時指出，歐洲後共國家的民主轉型以及政黨政治的發展，具有三項不可忽視的背景條件：共產時期的經社背景、轉型後的制度設計、轉型期間的菁英互動。就這三點而言，顯示出歐洲的後共國家，在民主轉型的初期，其政黨政治的穩定性、制度化條件偏低，政黨體系變遷程度較高。Millard甚至進一步指出，許多後共國家設計總統直選，強化個人特質，對於發展穩定的政黨政治較為不利（Millard 2004, 7）。不僅如此，由於政治菁英在民主化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政黨發展依附個人的情況，也將強化這些政黨民粹風格、低度制度化的特質（Millard 2004, 69-70）。Lipset在後續對政黨體系與社會分歧的討論時也指出，歐洲的後共國家在民主化後，是否能夠發展出制度化、規則性的多黨體系，有其歷史上的特殊性（Lipset 2001, 9）。凸顯出共產時期的統治過程，後共國家在民主轉型的特殊性，都將使這些國家民主化後，政黨體系發展的穩定度，與鄰近的

西歐國家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Lewis在討論後共地區政黨體系與民主發展時指出，多數後共國家在政黨發展與選舉競爭呈現四個發展階段：首先是民主化開啓，政黨體系開始多元發展；其次是政黨的社會屬性定位；第三是共產黨轉型與持續執政；最後是多黨體系發展成左-右兩翼對決的趨勢。由於民主化時間是過往三十餘年，因此政黨的社會屬性與定位都還在重組的階段，因此中、東歐國家有許多政黨，其社會屬性尚不明確，發生體系變遷的狀況也相對偏高（Lewis 2001, 10）。除此之外，Sarah Birch在討論選舉制度與民主轉型時指出，中、東歐的後共國家，在90年代初從一黨專政開放選舉，有些直接採取比例代表制，有些採取混和制，但都面臨兩個問題：其一，這些國家在民主轉型時伴隨社會低度的整合。國家認同、族群政治、宗教差異…等，都在選舉制度發酵下，影響政黨體系的穩定。其二，在歐盟東擴的影響下，有些國家在2004年加入了歐盟，對於國家主權、加入歐盟的想像，也成為政黨政治競爭的議題（Birch 2003, 8-9）。是以，中、東歐的後共國家，有許多社會內部、國際政治的議題需要重新整合，政黨體系的不穩定性也就更高一些。

回到總統的角色來看，Vít Hloušek等學者研究中、東歐許多共產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斯洛維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10個國家。在綜整這些國家的研究後指出，總統直選必然提高總統在政治場域的影響力。有些時候，在國會與政府的互動過程中，總統的影響力甚至凌駕於政黨之上（Hloušek 2013, 272-273）。此外，因為歷史的遺緒以及個人的聲望，也都可能是提高總統政治影響力的因素。Hloušek因此指出，憲法上的規範可能無法幫助我們判斷總統的政治影響力，在直選的背景下，總統的個人特質與魅力，將可能使政黨成為總統領導政府與影響國會的工具（Hloušek 2013, 294）。Hloušek等學者的研究，提供本文重要的基礎，也呼應了本文的假設，那就是中、東歐的共產轉型新興民主國家中，總統職位如果為直選產生，將可能使政黨政治的運作受到總統這個角色的影響而產生質變，也就是所謂政黨總統化的趨勢。

本文以前述既有文獻為基礎，認為直選總統、選舉時程、以及民主化因素，必然成為影響政黨體系發展的原因。在假定直選總統的國家，會使候選人

將政黨認同建立在對總統的認同之上，這樣的認同基礎比意識形態、身分或階級認同都來得弱，因此政黨體系變遷會因為總統選舉而更容易發生。其次，在選舉時程上，也一併驗證直選總統國家，是否在同時選舉或蜜月選舉下，有較強的衣尾效應。在個案分析上，本文將分析歐洲中的歐盟國家，並且依據民主化程度區分為中、東歐的後共新興民主國家，以及西歐國家兩組。在控制歐盟的外部條件下，一方面可以再控制民主化因素的差異性，在兩組個案中各自進行憲政差異的比較，二方面則是就這兩類國家，依據民主化程度的差異，討論政黨發展與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以下將進行研究假設的陳述，以及資料分析時，對於變數的界定與操作化。

參、研究假設與變數界定

本文旨在探索直選總統的制度因素以及民主化的程度等，與政黨體系變遷之間的關連性。在提出主要的假設以前，有必要先界定本文在理論架構中提及的變數與其操作定義。首先，本文的依變項是政黨體系變遷。Lipset與Rokkan在1967年曾經提出「政黨體系凝結」的現象。這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核心意義在於形容主要政黨與社會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穩定連結。Lipset與Rokkan一方面是以西歐的老牌民主為主，二方面探討「凝結」的原因時，是以社會分歧為主要的自變項。包括中央-邊陲的地緣分歧、城市-鄉村的地理分歧、資本-勞動的階級分歧、以及宗教-國家的認同分歧等。而所謂的凝結，在Lipset與Rokkan則並未有操作化的具體定義。文獻上也有許多對Lipset與Rokkan「政黨體系凝結」的討論，例如Sitr (2002)、Bertoa (2014)、Mair (1997)、Erlingsson (2009)、也包括臺灣的學者Shyu (2011)等，但都偏向概念引用，較缺少具體的、操作化的去定義體系的變遷。例如Mair針對政黨體系變遷時指出，政黨體系變遷包括了政黨變遷。發生在社會分歧變遷、制度變遷之後。當政黨體系從類型A轉變為類型B，即為政黨體系變遷 (Mair 1997, 51-52)。Mair僅提及，政黨體系變遷是一種現象，但並未再具體討論如何標準化的測量類型間的轉換。

本文自行設定政黨體系變遷的標準，廣義來看，指的依舊是政黨制度化、

政黨穩定的程度等，但嘗試給予操作化與標準化，以在本文建立一個相同的比較標準。基於此，本文所謂的政黨體系變遷，指的是在一次選舉中，出現以下情況：1. 出現新興政黨，包括政黨更名，並且投入選舉即取得國會相對大黨之地位。為使此一標準操作化，界定為首次進入國會即取得前三大黨之地位；2. 前兩大政黨在與前次選舉相較之下，贏得或失去超過50%的席次，亦即出現巨幅逆轉，或是泡沫化的趨勢；3. 先前在國會前三大之政黨，在一次選舉中喪失全部席次。滿足前述三種情況之一，該次選舉即定義為發生政黨體系變遷。情境如下表1：

表1 政黨體系變遷示意

前次選舉		本次選舉		意涵
政黨	得票率	政黨	得票率	
A	40%	E (更名)	45%	I 政黨更名
B	35%	B	15%	II 減幅超過50%
C	25%	C	0	III 政黨退出國會
X	X	D	40%	IV 新政黨進入國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對於政黨體系變遷、政黨重組，過去的研究大多是以「概念界定」，較少提出可操作的具體指標。例如Sartori (1976) 以政黨聚合、意識形態距離來分析政黨體系的變化。但這些變數大多以概念的方式呈現，需要大量的資料說明，或是對變數進行文字或語意分析，甚至有可能受到研究者主觀認定所干擾。如果要針對一定數量的個案進行標準化的客觀比較，編碼與量化是研究方法之一。基於此，本文希望能客觀的以敘述統計的方式來比較政黨體系變遷，因此需要建立一組具體的、可操作的同時也是標準化的編碼指標。

此外，也有相關的指標可以提供政黨體系變遷的研究，例如Laakso與Taagepera (1979) 建立的「有效政黨數」(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計算方式。但有效政黨數是以各政黨的席次率平方和為分母，除以一

以後的結果。這個數字表現的，是國會中政黨體系整體的聚合程度，對於多個政黨同時發生裂解、合併，或是新興政黨、政黨泡沫化，則未能準確形容。例如，一次選舉中，出現一個新興政黨、也出現一個政黨泡沫化，一消一長的結果，在有效政黨數的計算上可能看不出差異。

本文所提出的幾種指標中，在具體的編碼標準確實都有調整的空間。設計這些標準只是爲了以單一標準進行編碼，以求後續進行敘述統計來進行比較研究的需要。以方法論來說，更動編碼標準（例如將得票率減幅從50%更動爲40%或60%）確實會有不同的編碼結果，但就研究發現而言，並不會產生反差的結果。在這之中，政黨更名是否意味著政黨體系變遷可能較具爭議。每個國家政黨更名的理由各有所異，一般來說，政黨變動名稱的原因包括政黨合併或分裂、宣示政黨意識形態的變化、符合社會價值變動…等。就廣義而言，大多的更名過程，是伴隨一定程度的政黨重組或是意識形態變化，也就具有政黨體系變遷的內涵，只是強度、向度難以從更名結果測量。有些時候，政黨更名固然有可能只是形式上改變名稱，實質的社會基礎與更名前大致相同，嚴格來說甚至難以歸類爲政黨體系變遷。雖然如此，本文爲了避免操作上的混淆，只要是出現政黨更名，均視爲政黨體系的變遷。主要的原因在於：1. 難以實質測量每次更名後的社會基礎是否變化；2. 大多數更名伴隨或具有一定程度的體系變遷；3. 整體而言，採放寬標準的測量和定義，並不會改變本文三個核心假設在理論基礎上的準確性。

在自變項上，本文關注的核心變數是總統直選與否、選舉時程、以及民主化時程。首先，總統直選與否是類別變數，直選與否就區分爲兩類，沒有爭議。第二，在直選總統的國家中，總統與國會的選舉時程可以分成同時選舉、蜜月期選舉以及其他。同時選舉係指總統與國會同日舉行改選，也無爭議。蜜月期選舉對於所謂的蜜月期，學界亦有不同的界定。一般來說，時間越接近，衣尾效應越強。本文將蜜月期採用較寬鬆的界定在一年的時間內，亦即，總統選舉後一年內舉行國會選舉，均定義爲蜜月期選舉。非同時選舉也非蜜月期選舉的時程安排，歸類在其他。第三，關於民主化的部分，本文區分爲中、東歐的後共新興民主國家、以及西歐二類，藉以觀察二類國家政黨體系變遷的情況。

在核心假設的部分，第一個基本的假定在於直選總統會導致競選總統的政黨將偏向總統化發展。而一旦政黨組織、發展趨勢，出現總統化的現象，政黨的聲勢與支持度，將一定程度的依附於總統或總統候選人身上。在這種情況下，該政黨在國會選舉的表現會受到總統選舉的勝敗、總統以及競爭者的政治聲望、以及總統與競爭者的個人化因素所影響，而連帶使得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提高。此外，總統選舉的過程，也容易刺激政黨分裂，或是因為選舉而組織新的政黨，這都加速了政黨體系變遷的發生。基於此，本文提出的第一項假設如下：

假設一：以國會選舉來說，具有直選總統的國家，發生政黨體系變遷的次數與強度會高於沒有直選總統的國家。

既然直選總統會對政黨體系變遷產生影響，選舉時程也會成為另一個影響政黨體系變遷的變數。對於選舉時程的研究，一般認為在直選總統的國家中，如果總統和國會同時改選（同時選舉），或是總統選舉結束後，短時間內進行國會選舉（蜜月期選舉），會出現所謂的「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基於衣尾效應的假設，總統選舉的影響力將涵蓋於國會，前述假設一的情況將在同時選舉或是蜜月期選舉中更為顯著。不僅如此，因為小黨在總統選舉中容易被邊緣化，甚至不會提出候選人，因此在同時選舉或蜜月選舉下，小黨泡沫化的機率也較高。是以，本文的第二項假設如下：

假設二：以國會選舉來說，在總統直選的國家中，同時選舉或蜜月期選舉，會有較高的機率發生政黨體系的變遷，小黨泡沫化的機率也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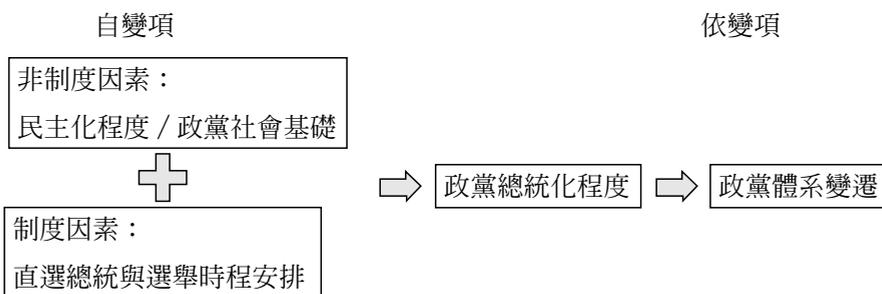
最後，在論及憲政體制對政黨體系變遷的影響時，民主化的程度也可能影響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一般而言，民主化開啓的時間越晚，社會的組織性以及與政黨的連結越弱，政黨制度化也越低，越可能導致政黨個人化。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強調原子化社會，將更強化此一特性。如同學者Kopecky'所形

容，後共國家的社會動員朝向恩庇侍從的方向發展，政黨的社會基礎越薄弱，也越容易發生政黨體系變遷。以民主化時程來看，西歐地區的民主化程度高於中、東歐的新興民主，因此位在西歐的國家，政黨組織與社會基礎越穩定，中、東歐的後共國家則否。基於此，本文提出第三項假設如下：

假設三：以國會選舉來說，中、東歐的共產轉型新興民主國家，發生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將比西歐國家來得高。

彙整前述三項假設，本文對於影響政黨體系變遷的原因，提出非制度與制度的理論假設。非制度的部分，指的是民主化的因素，也就是從共產主義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市民社會和政黨發展都不像西歐的民主國家來得緊密。在這種條件下，直選總統，加上選舉時程的制度性安排，會使得政黨發展出現總統化的趨勢。一旦政黨發展過於仰賴總統，而不是完整的社會基礎，將會提高政黨支持度大起大落的機率，也就是較容易發生政黨體系的變遷。以中、東歐國家的經驗來看，非制度與制度的因素並非各自發生影響力，而是相互強化後對政黨體系變遷產生影響。簡化為理論架構如下圖：

圖1 本文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以下將依照此前述的變數操作，先回顧檢閱與研究架構有關的相關文獻，再以歐盟27個會員國為樣本，討論直選總統、選舉時程、民主與歷史遺緒等因素，對政黨體系變遷的影響。

肆、資料與案例分析

爲了控制民主化背景的差異，在個案分析上本文以歐盟27國家爲主體，並且依據民主化時間分成兩組：西歐（法國、葡萄牙、芬蘭、愛爾蘭、奧地利、德國、義大利、希臘、馬爾他、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瑞典、西班牙、賽浦路斯等16國）；³與中、東歐的後共國家（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匈牙利、捷克等11國）。將27個個案區分爲中、東歐及西歐兩個地區來分析，最後再合併全部個案觀察總體趨勢。選舉資料則是選取距今回溯五屆的國會選舉與總統選舉資料，以降低民主化初期政黨政治不穩定的干擾。東歐國家包括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等11國；西歐地區的國家則包括芬蘭、愛爾蘭、奧地利等16國。其中總統直選的國家有14個；⁴議會內閣制的國家14個（個案請參見表2）。以下分別在三個區塊中，選取部分個案做分析。

表2 歐盟27國的憲政類型、地區別以及自由之家平均分數⁵

國家	憲政類型	分布地區	自由之家
捷克（2013年起總統直選）	議會內閣轉半總統制	中、東歐	93.11
立陶宛	半總統制	中、東歐	90.17
波蘭	半總統制	中、東歐	90.61
羅馬尼亞	半總統制	中、東歐	81.17
斯洛伐克	半總統制	中、東歐	89.56
斯洛維尼亞	半總統制	中、東歐	91.72

³ 本文將馬爾他和賽浦路斯歸類爲西歐的個案，主要是考量歷史背景與中、東歐後共的差異性。馬爾他長期受英國殖民，在1964年頒佈獨立憲法，1974年修憲爲共和國。賽浦路斯在19世紀也是英國殖民地，1960年獨立。這兩國雖然遲至2004年才加入歐盟，但都有英國殖民的歷史背景，而非共產專制轉型而來，因此在本文分析時將其歸類爲西歐這一組。

⁴ 捷克在2013年起總統直選，2013年以前的選舉列入議會內閣制的個案，2013年以後列入總統直選的個案來分析。

⁵ 自由之家之平均分數，爲2003年至2020年，共18年資料之平均值。

表2 歐盟27國的憲政類型、地區別以及自由之家平均分數（續）

國家	憲政類型	分布地區	自由之家
保加利亞	半總統制	中、東歐	82.28
克羅埃西亞	半總統制	中、東歐	84.72
匈牙利	議會內閣制	中、東歐	85.17
愛沙尼亞	議會內閣制	中、東歐	93.78
拉脫維亞	議會內閣制	中、東歐	86.44
賽浦路斯	總統制	西歐	94.28
法國	半總統制	西歐	93.50
芬蘭	半總統制	西歐	99.83
愛爾蘭	半總統制	西歐	96.78
奧地利	半總統制	西歐	96.44
葡萄牙	半總統制	西歐	97.06
德國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5.78
義大利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0.00
希臘	議會內閣制	西歐	85.72
馬爾他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6.39
荷蘭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8.94
比利時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6.83
盧森堡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9.28
丹麥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7.72
瑞典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9.83
西班牙	議會內閣制	西歐	94.7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中、東歐新興民主

歐盟的後共國家中，羅馬尼亞是政黨重組以及政黨總統化都顯著的國家。

2004年的大選年，是總統與國會同時選舉。先前的執政黨Social Democratic Pole of Romania因為內部分裂，改組並改名為National Union PSD+PUR，並推舉Adrian Năstase角逐總統。另一方面，前布加勒斯特市長Traian Băsescu整合右派分散勢力，於2003年組成Justice and Truth Alliance，並參加了2004年的總統與國會選舉。2004年可以視為羅馬尼亞政黨重組以及總統化發展關鍵的一年。2004年的同時選舉，Băsescu當選總統，且他所領導的新政黨Justice and Truth Alliance一口氣拿下31.3%的得票率以及112席次，僅落後National Union PSD+PUR 20席，成為國會第二大黨。此後，在2008年、2012年，羅馬尼亞歷經多次政黨改組，中間偏左與偏右的兩大勢力不斷出現政黨易名、改變結盟對象的情況，整體而言，政黨政治偏向左右兩聯盟發展，但並不是非常穩定。

捷克是東歐中存在直選但弱勢總統的個案，歸類為總理總統制的國家。依據本文的推論，雖然是直選總統，但因為不扮演政府領導人的角色，因此選舉的衣尾效應以及對政黨重組的影響力有限。在直選總統的半總統制國家中，捷克是從議會內閣制轉出為總理總統制的國家，以議會制為憲政基礎的捷克，到2013年才首次直選總統，總統的權力在半總統制國家中並不強。2013年首次的總統大選中，Miloš Zeman代表Party of Civic Rights贏得了總統選舉，但他帶領的政黨Party of Civic Rights竟然只獲得1.51%得票率，沒有任何席次。可以說沒有產生任何的衣尾效應，也沒有引起政黨重組。2017年Miloš Zeman代表Party of Civic Rights在總統選舉中連任成功，但所屬政黨Party of Civic Rights在2017年國會選舉甚至只獲得0.36%得票率，未取得任何席次。可以看出，捷克的直選總統對國會選舉沒有明顯的影響力。雖然如此，對照捷克在議會內閣制轉為半總統制前後可以發現，2013年之後的政黨重組也確實比之前來得顯著。2002、2006、2010年的國會選舉，僅2010年出現新興政黨TOP 09在該年選舉成為第三大黨。但在2013年之後，政黨重組的幅度變得相當劇烈，在2013年新興政黨ANO 2011一舉成為第二大黨，更在2017年成為第一大黨，而在國會中多次位居第一大黨的Czec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2017年迅速泡沫化，出現了巨幅的政黨重組。這樣的發展趨勢也和本文的假設相符。

東歐另一個直選總統造成政黨重組以及衣尾效應顯著的國家是波蘭。以2001年的選舉作為對照，2005年出現了政黨重組以及蜜月選舉下的衣尾

效應。在2005年的選舉中，先是Lech Kaczyński代表Law and Justice在10月贏得總統選舉，該黨在11月從過去第四大黨，一舉躍升為第一大黨，席次從44席暴增為155席，衣尾效應和政黨重組均相當顯著。到了2007年，老牌政黨Democratic Left Alliance解散，Civic Platform贏得209席，再次發生政黨重組。2011年、2015年的選舉，也都有政黨重組的情況。其中在2015年，Andrzej Duda代表Law and Justice再度贏得總統，而該黨也在2007失去第一大黨的地位後，因為衣尾效應的關係，在2015年一口氣取得235席，是2001年以來，波蘭首度有單一政黨過半的情況，可見直選總統的衣尾效應以及對政黨重組的影響力相當顯著。

彙整東歐的個案，11個個案中，有8個總統直選的國家，在這些直選總統的國家共有38次的選舉中，出現了30次符合本文定義的政黨重組，比例為78.95%。全數都有政黨體系變遷的經驗。在8次同時或蜜月選舉中，有4次選舉發生了衣尾效應。另外，沒有直選總統國家的選舉（匈牙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2013年以前的捷克）有17次，僅有4次政黨重組，比例僅23.53%，遠低於直選總統的國家。整體而言，也和本文假設若合符節。東歐的選舉資料，請見下表3。

表3 中、東歐11國的選舉資料分析

國家		衣尾次數	蜜月/同時次數	變遷次數	選舉次數
有總統直選	立陶宛	0	1	5	5
	波蘭	2	2	5	5
	羅馬尼亞	2	2	5	5
	斯洛伐克	0	0	4	5
	斯洛維尼亞	0	1	3	5
	保加利亞	0	1	2	5
	克羅埃西亞	0	1	3	5
	捷克2013後	0	0	3	3
	小計	4	8	30	38

表3 中、東歐11國的選舉資料分析（續）

國家		衣尾次數	蜜月/同時次數	變遷次數	選舉次數
無總統直選	捷克2013前	0	0	0	2
	匈牙利	0	0	2	5
	愛沙尼亞	0	0	0	5
	拉脫維亞	0	0	2	5
	小計	0	0	4	17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二、西歐的民主國家

西歐16個分析個案中，有6個國家存在直選總統，10個議會內閣制的國家。在西歐地區，政黨體系確實相對穩定，但仔細比較以後，6個直選國家中，除了芬蘭沒有出現政黨體系變遷，其餘5個個案都有政黨體系變遷的經驗。此外，6個國家的選舉時程中，符合同時或蜜月期選舉的共有6次（4次集中在法國），有5次發生了衣尾效應。相反的，在10個議會內閣制的國家中，有4個國家完全沒有出現政黨體系變遷，其餘也大多僅有一、兩次，且幅度不大，只有義大利發生過4次符合本文界定的政黨體系變遷。

西歐的直選總統國家中，法國是政黨重組、衣尾效應都最具代表性的個案。以法國1997年作為對照的起點，2002年是修憲改為蜜月選舉後的首次大選年。在該年選舉中，Rally for the Republic併入2002年成立的Union for a Popular Movement，並且在衣尾效應下，由Jacques Chirac贏得總統，並且在國會贏得過半的357席。該年同時發生政黨體系變遷與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2007年的選舉中，Nicolas Sarkozy代表Union for a Popular Movement贏得總統，在衣尾效應下，也維持了該黨在國會的多數地位。而在該年選舉，新興政黨New Centre組成，並且成為國會第三大黨。雖然遠遠落後兩大政黨，但首次參選就取得第三大黨的地位，符合了本文對政黨體系變遷的定義。到了2012年，雖然沒有出現政黨重組，但蜜月選舉下的衣尾效應仍舊存在，並且產生左

右的政權輪。而2017年則是再次發生政黨體系變遷，Emmanuel Macron組織新政黨En Marche!，不僅贏得總統選舉，該黨甚至以新興政黨之姿，一舉贏得過半的308席，凸顯了蜜月選舉的衣尾效應，也是一次巨大的政黨體系變遷。

葡萄牙是另一個西歐的半總統制國家，也是發生過政黨體系變遷與衣尾效應的個案。以2005年的選舉作為對照的起點，2009年、2011年兩次選舉，都沒有出現政黨體系變遷，但2011年出現蜜月選舉，也出現衣尾效應。Anibal Cavaco Silva代表Social Democratic贏得總統，該黨在蜜月選舉下，從2009年第二大黨，87席的情況，成長到第一大黨的108席。到了2015年，葡萄牙左派政黨產生政黨體系變遷，並成立政黨聯盟Portugal Ahead來參選，原本執政的Social Democratic併入Portugal Ahead，但在Madeira和Azores兩個選區維持原黨名，取得了5個席次。Portugal Ahead在2015年勝選之後，馬上就面臨不信任投票並且解散，在2019年回到2015年以前的政黨競爭的格局。

整體而言，西歐的半總統制國家政黨體系變遷的情況並不如中、東歐的後共地區來得激烈，但與同為西歐其他議會內閣制的國家相較之下，直選總統的國家發生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依舊比較高。彙整西歐地區的國家資料，6個直選總統國家，共30次選舉的觀察值，發生了10次的政黨體系變遷，比率為33.33%，確實比起東歐的新興民主來得低。但其他10個西歐的議會內閣制國家，共計50次的選舉觀察值，僅10次政黨體系變遷，比例為20.00%。兩相比較之下，控制在民主成熟度較高的西歐地區中，直選總統的國家發生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依舊較高，同時或蜜月選舉的衣尾效應也相對顯著，符合了本文的假設。西歐16個國家的選舉資料請參見表4。

表4 西歐16國的選舉資料分析

國家		衣尾次數	蜜月 / 同時次數	變遷次數	選舉次數
有直選總統	芬蘭	0	1	0	5
	愛爾蘭	0	0	1	5
	奧地利	0	0	1	5
	法國	4	4	4	5

表4 西歐16國的選舉資料分析（續）

	國家	衣尾次數	蜜月 / 同時次數	變遷次數	選舉次數
有直選總統	葡萄牙	1	1	3	5
	賽浦路斯	0	0	1	5
	小計	5	6	10	30
無直選總統	義大利	0	0	4	5
	希臘	0	0	1	5
	馬爾他	0	0	1	5
	荷蘭	0	0	0	5
	比利時	0	0	2	5
	盧森堡	0	0	0	5
	丹麥	0	0	0	5
	瑞典	0	0	0	5
	西班牙	0	0	1	5
	德國	0	0	1	5
	小計	0	0	10	50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三、歐盟的整體分析

前述的分析，是將歐盟國家再以民主化差異分成兩組，以控制民主化差異的影響。最後本文彙整總體資料，可以凸顯憲政體制的變數，在跨越民主化因素後，仍舊有一定的解釋力。因此本文在最後以直選總統與否，以及選舉時程這兩個變數，進行跨區的總體比較。全部27個國家中，有14個直選總統的國家，14個議會內閣制的國家（捷克從議會內閣制改為半總統制，按時間先後分列兩組資料中，因此27個國家有各14組的觀察個案）。在14個總統直選國家中，觀察其68次的選舉，共有40次產生了政黨體系變遷，比例為58.82%。在14次同時或蜜月選舉中，有9次出現衣尾效應，比例為64.29%。相較於此，14

個議會內閣制的國家，觀察其67次的選舉，僅有14次的政黨體系變遷，比例為20.90%，遠低於直選總統的國家。而因為沒有總統選舉，所以也沒有衣尾效應的問題。

接著本文再控制選舉時程的變數，觀察衣尾、蜜月、同時選舉，對政黨體系重組的影響。對於衣尾效應而言，本文接受既有研究的假定，認為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同時舉行，或是蜜月選舉，都會具有憑藉總統拉抬國會與政黨選情的效應。在具體分析中，不同國家、不同次的選舉、甚至不同候選人，衣尾效應的強弱會不一致。但整體而言，都會有衣尾效應的發生，只是程度差異。是以，本文僅以選舉時程，將總體資料二分為衣尾效應的有無，而暫不分析衣尾效應在個別國家與逐次選舉的強度。以類別資料分析衣尾效應對政黨體系重組的影響，並不會改變分析結果。從資料來看，不分西歐與中、東歐的總體資料發現，所有具直選總統與議會選舉的國家中，共有18次的選舉具有衣尾效應的條件，這18次的選舉中，發生了14次的政黨體系變遷，比例高達77.78%。儘管仍有25次的政黨體系變遷不是發生在衣尾效應的選舉時程，但可以說只要有衣尾效應，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就大幅提高。此外，區分西歐與中、東歐兩個群組來看，西歐有總統直選的國家中，總數6次的衣尾效應選舉，有3次發生政黨體系變遷，而中、東歐國家有12次的衣尾效應選舉，則是出現11次的政黨體系變遷。這顯示了在中、東歐國家，直選總統搭配衣尾效應的選舉時程，政黨個人化的情況更顯著，也更容易發生政黨體系變遷。就總體資料來看，有三個關於選舉時程這個變數值得提出的發現：第一、選舉時程不是政黨體系變遷的唯一原因。就資料來看，仍舊有一定比例的政黨體系變遷，發生在非衣尾效應的選舉之後；第二、只要有衣尾選舉，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就大為提高；第三、衣尾效應對政黨體系變遷的影響，在中、東歐比在西歐更為顯著。關於選舉時程與政黨體系變遷的資料，彙整如表5。

表5 選舉時程與政黨體系變遷

地區	國別	衣尾	衣尾+變	衣尾+未變	非衣尾+變	總數
西歐	法國	4	3	1	1	4
	賽浦路斯	0	0	0	1	1
	葡萄牙	1	0	1	2	2
	芬蘭	1	0	1	1	1
	愛爾蘭	0	0	0	1	1
	奧地利	0	0	0	1	1
	西歐	6	3	3	7	10
中、東歐	羅馬尼亞	4	4	0	1	5
	斯洛伐克	0	0	0	4	4
	立陶宛	1	1	0	4	5
	斯洛維尼亞	1	1	0	2	3
	保加利亞	1	0	1	2	2
	克羅埃西亞	1	1	0	2	3
	波蘭	4	4	0	1	5
	捷克2013後	0	0	0	3	3
	中、東歐	12	11	1	19	30
合計		18	14	4	25	40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最後，就實際的資料分析來看，本文控制總統直選的變項後，西歐的6個國家，30次選舉中，共有10次的政黨體系變遷，比例為33.33%；而東歐有8個國家，38次選舉中，高達30次的政黨體系變遷，比例為78.95%，是西歐國家兩倍以上的強度，顯見控制直選總統因素後的因素後，中、東歐國家比起西歐國家，在政黨體系穩定性上有顯著的差異。在非直選總統的部分，中、東歐的17次選舉個案中，有4次發生重組，比例為23.53%；西歐50次的選舉中則發生10次，比例正好為20%。中、東歐仍是略高於西歐，但差距不若控制直選總統

後那麼顯著。這顯示了中、東歐與西歐兩個群組間，確實因民主化、歷史遺緒差異，而存在政黨體系穩定度不一的情況，而這個情況受到直選總統的催化，在中、東歐具直選總統的國家中，政黨體系呈現最不穩定的一組。

控制直選總統的變數後，觀察到中、東歐的新興民主，政黨體系變遷較西歐劇烈，是驗證了本文的第三項假設，也就是共產威權的歷史遺緒，對於民主化後政黨體系變遷的影響。在中、東歐，受到過去共產黨非民主方式的治理，在威權或極權統治下，市民社會自主性的組織、活躍性都偏低。在民主化後，社會與政黨的凝結程度，相較於已經民主鞏固的西歐，也明顯較弱，容易出現政黨體系的變遷。就民主化這個概念來看，中、東歐的新興民主，在開放選舉後，必須同時處理社會低度組織與整合的問題，也就是重新面對族群、認同、宗教…等差異。不僅如此，有些後共國家在是否加入歐盟，以及加入歐盟談判的議題上，也影響了政黨和市民社會的連結強度。這些議題同時處理，對中、東歐的後共國家來說，都提高了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

再對比中、東歐與西歐民主化的表現，以「自由之家」從2003年至2020年的資料來看，歐盟中11個後共國家，18年來的總體平均分數為88.06分，而16個西歐國家，18年的總體平均分數高達95.8。顯見中、東歐的民主國家，即使已經民主轉型超過10年，民主成熟度整體而言仍舊不若西歐，因此政黨體系也相對不穩定，發生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也比較高（歐盟27國從2003年至2020年自由之家評比的分數請參閱附表）。

這樣的趨勢呼應了本文在先前以及若干文獻所提出，中、東歐從共產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社會整合的程度本來就比西歐更低，政黨依附政治強人、恩庇侍從的現象比西歐顯著。而直選總統的制度設計，更強化了政黨發展受到總統個人化所影響，容易出現低制度化的現象。也就是Samuels與Shugart所謂的總統化政黨。總統化政黨會使得政黨體系凝結的程度降低，因為政黨體系的穩定與否，將受到總統個人的因素所影響。過去的研究多數依據意識形態、社會分歧、政黨認同、階級屬性…等社會分歧的變數，來研究政黨體系凝結的程度。經由本文總體資料的分析發現，直選總統作為憲政體制的特性，對於降低政黨體系凝結的趨勢，確實有其影響力。

既有的研究中顯示，政黨在社會上與選民建立的認同關係，受到社會分歧

的各種類型所影響，呈現出來的是一種較趨於穩定的凝結狀態。本文進一步提出了制度因素（直選總統與選舉時程）、非制度因素（民主化與歷史遺緒），希望能補充對政黨體系變遷更細緻的解釋。在分別控制民主化、直選總統、選舉時程等變數後，本文觀察歐洲中歐盟27國的總體現象，以及區分西歐與中、東歐兩組個案來進行比較。整體而言，驗證了本文的假設：直選總統、具有衣尾效應的選舉、以及中、東歐新興民主，都有較高的機率發生政黨體系變遷。

伍、結論

憲政體制與政黨體系的連動，是比較政治中古典也重要的核心議題。過往的研究，著重在政黨體系的差異性，對憲政運作的影響，並且可以進行跨國或跨類型的比較。最典型的討論就是兩黨或多黨制，搭配總統或議會內閣制後，對民主鞏固的影響。既然政黨體系可以影響憲政體制的運作，那麼憲政體制的類型，也應該牽動著政黨體系的發展與穩定。基於此一關懷核心，本文討論直選總統對政黨體系變遷的影響，認為直選總統會提高「政黨總統化」的機率，尤其在同時或蜜月選舉時，政黨受到總統的影響不只有選舉結果，更有因總統而壯大或是泡沫的情況。

除此之外，政黨之所以容易出現總統化的趨勢，在制度因素上是總統直選的影響，而非制度因素的條件，就是政黨本身和市民社會的連結並不穩固。亦即，當政黨的社會基礎不穩固時，政黨更有可能因為直選總統而產生較大幅度的支持度變化，也就是發生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將因此增加。基於這些假設，本文檢驗了歐洲中歐盟27個國家，包括中、東歐的後共新興民主與西歐民主這兩類的國家，觀察三項問題：第一、直選總統是否對政黨體系的變遷產生引力；第二、直選總統的國家中，選舉時程是否強化了衣尾效應，加速與擴大政黨體系變遷的發生機率；第三、就民主化的因素來看，整體的趨勢呈現中、東歐後共新興民主的政黨總統化程度較西歐為高的情況，並反應在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與規模上。這三個問題，第一個和第二個是制度性因素，假定總統直選以及選舉時程，對政黨體系變遷有其影響；第三個是非制度性因素，假定民主

化程度、轉型前的社會基礎，影響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而制度與非制度性因素，是相互強化後對政黨體系變遷發揮影響。

本文在實證研究後發現，前述三項假定均得到普遍的支持。儘管有少數個案可能與假設有落差，但整體而言，直選總統以及同時選舉或蜜月選舉確實提高了政黨體系變遷的機率，而中、東歐後共國家的政黨體系變遷，也確實較西歐為高。簡而言之，中、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在非制度的因素來看，民主轉型前的共產威權，使得社會組織的發展與政黨政治關係較為薄弱。也就是政黨的社會基礎不像西歐國家來得穩定。而這個現象，受到總統直選的影響，尤其是蜜月期選舉、同時選舉帶來的衣尾效應下，將使政黨依附總統，並出現國會得票率較大幅度震盪的結果，也就是本文所欲解釋的政黨體系變遷。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既然核心的中介變數是政黨總統化，那麼總統的政治影響力是否也應該對政黨體系變遷產生影響呢？亦即，具有較強政治實力的總統，該國的政黨體系變遷，理應更容易隨著總統個人聲望與支持度的高低而發生。但依據實際經驗來看，這項假定並未得到證實。這提供了直選總統與政黨體系變遷另一個謎團有待解決。也就是直選總統和政黨體系變遷具有關連性，但總統權力則否。那麼，政黨體系變遷與直選總統之間的因果關係，該如何得到更精準的確立？這或許是相關研究後續可以繼續深入探究的議題。

（收件：109年4月26日，接受：110年1月28日）

Directly Elected President, Democratization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uropean Countries

Yu-chung Shen

Professor, Dep.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You-chen Chen

Master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Party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explain the constitutional work and consolidation of a democracy, and especially for newly democracies. If the party system would be affect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co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historical legacy, the party system should also be changed. We have three hypotheses: first, we suppose those countries with a directly elected president will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for party system change. And the smaller parties are more likely out of parliament. Second, based on the coattail effect, countries with the concurrent election or the honeymoon election will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for party system change. Third, the degree of democratization will also be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measuring party system change. The party system change will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such a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refore, this paper goes to show that among these three hypotheses, directly elected president and electoral timing are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while the degree of democratization is historical legacy.

Keywords: Party System Change, Direct Elected President, Electoral Timing, Democratization, European

參考文獻

- 吳文程，1994，〈憲政體制、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東吳政治學報》，3：151-186。Wu, Wen-chen. 1994. "Xian zheng ti zhi, zheng dang zheng zhi yu xuan ju zhi du" [Constitutional System,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oral System].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151-186.
- 吳玉山，2012，〈半總統制—全球發展與研究議程〉，沈有忠、吳玉山主編，〈權力在哪裡？從多個角度看半總統制〉：1-28，臺北：五南。Wu, Yu-shan. 2012. "Ban zong tong zhi - quan qiu fa zhan yu yan jiu yi cheng" [Semi-Presidentialism: Global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 Agenda]. In Yu-chung Shen and Yu-shan Wu, eds., "*Quan Li Zai Na Li: Cong Duo Ge Jiao Du Kan Ban Zong Tong Zhi*" [Where is the Power? Watching the Semi-Presidentialism in Multi Point of View], pp. 1-28. Taipei: Wunan.
- 沈有忠，2012，〈半總統制「權力總統化」之比較研究〉，《臺灣民主季刊》，9 (4): 1-36。Shen, Yu-chung. 2012. "Ban zong tong zhi 'quan li zong tong hua' zhi bi jiao yan jiu"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Power Presidentialization' of Sem-Presidentialism].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9 (4): 1-36.
- 李鳳玉、黃建實，2015，〈總統兼任黨主席對政府法案通過的影響：陳水扁政府時期的分析〉，《政治科學論叢》，64: 85-136。Lee, Feng-yu and Chien-shih Huang. 2015. "Zong tong jian ren dang zhu xi dui zheng fu fa an tong guo de ying xiang: chen shui bian zheng fu shi qi de fen xi" [Presidents as Party Chairmen and the Passage of Government Bills: An Analysis of Chen Shui-bian's Presidency].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85-136.
- 林繼文，2006，〈政府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一個配套論的分析〉，《選舉研究》，13 (2): 1-35。Lin, Jih-wen. 2006. "Zheng fu ti zhi xuan ju zhi du yu zheng dang ti xi: yi ge pei tao lun de fen xi" [Power Division, Voting Rule, and Party System: What Do We See When They Are Considered

Together?].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3 (2): 1-35.

- 郝培芝，2013，〈半總統制的演化：總統化與內閣不穩定〉，《問題與研究》，52 (1): 101-141。Hao, Pei-zih. 2013. “Ban zong tong zhi de yan hua: zong tong hua yu nei ge bu wen ding” [The Evolution of Semi-presidentialism: Presidentialization and Cabinet Instability]. *Wenti Yu Yanjiu*, 52 (1): 101-141.
- 徐火炎，1992，〈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臺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5 (1): 213-263。Shyu, Huo-yan. 1992. “Min zhu zhuan xing guo cheng zhong zheng dang de zhong zu: tai wan di qu xuan min de min zhu jia zhi qu xiang, zheng dang pian hao yu dang pai tou piao gai bian zhi yan jiu” [Party Realignment in a Democratic Transition: A Study of Changes in Democratic Values, Party Preferences and Vote-Choices among Taiwanese Voter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5 (1): 213-263.
- 陳宏銘，2009，〈臺灣半總統制下的黨政關係：以民進黨執政時期為焦點〉，《政治科學論叢》，41: 1-55。Chen, Hong-ming. 2009. “Taiwan ban zong tong zhi xia de dang zheng guan xi: yi min jin dang zhi zheng shi qi wei jiao dian” [A Study of 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 under Taiwan’s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the Case of the DPP Government].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1: 1-55.
- 張峻豪，2012，〈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跨國研究〉，沈有忠、吳玉山主編，《權力在哪裡？從多個角度看半總統制》：61-102。臺北：五南。Chang, Chun-hao. 2012. “Ban zong tong zhi yun zuo lei xing de kua guo yan jiu” [A Cross-National Study on the Operational Type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Yu-chung Shen and Yu-shan Wu, eds., “*Quan Li Zai Na Li: Cong Duo Ge Jiao Du Kan Ban Zong Tong Zhi*” [Where is the Power? Watching the Semi-Presidentialism in Multi Point of View], pp. 61-102. Taipei: Wunan.
- 游盈隆，1994，〈政黨形象、意識形態與臺灣選舉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8: 61-99。You, Ying-lung. 1994. “Zheng dang xing xiang yi shi xing tai yu tai wan xuan ju bian qian” [Party Image, Ideology,

and Secular Realignment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8: 61-99.

- 謝復生，1994，〈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運作〉，《理論與政策》，8 (2): 5-13。Hseih, Fu-sheng. 1994. “Xian zheng ti zhi, xuan ju zhi du yu zheng dang yun zuo” [Constitutional System, Electoral System and Party Operation]. *Theory and Policy*, 8 (2): 5-13.
- 蘇子喬，2010，〈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配套思考〉，《政治科學論叢》，44: 35-74。Su, Tzu-chiao. 2010. “Xian zheng ti zhi yu xuan ju zhi du de pei tao si kao”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bining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with the Electoral System].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 35-74.
- 蘇子喬、王業立，2018，〈選舉制度與憲政體制的制度組合：半總統制民主國家的跨國分析〉，《選舉研究》，25 (1): 1-36。Su, Tzu-chiao and Yeh-li Wang. 2018. “Xuan ju zhi du yu xian zheng ti zhi de zhi du zu he: ban zong tong zhi min zhu guo jia de kua guo fen xi” [The Combination of Electoral System and Constitutional System: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5 (1): 1-36.
- Bertoa, Fernando Casal. 2014. “Party Systems and Cleavage Structures Revisited: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of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arty Politics*, 20 (1): 16-36.
- Birch, Sarah. 2003. *Elector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 Campbell, Angus, Phil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NY: Wiley Press.
- Elgie, Robert. 2005. “From Linz to Tsebelis: Three Waves of Presidential / Parliamentary Studies.” *Democratization*, 12 (1): 106-122.
- Elgie, Robert. 2011.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Semi-Presidentialism: Bringing Parties Back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6 (3): 392-409.
- Erlingsson, Gissur Ólafur. 2009. “Why Do Party Systems Tend to Be so Stable? A Review of Rationalists’ Contributions.” *Bifrös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

113-123.

- Hloušek, Vít. 2013. "The Political Role of Presidents in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me Tentative Conclusions." In Vít Hloušek, ed., *Presidents above Parties?* pp. 271-292. Brno, Czech Republic: Masaryk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Scott. 2005. "Patronage Regimes and American Party Development 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the Progressive Er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1): 39-60.
- Key, Valdimer Orlando Jr. 1955.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17 (1): 3-18.
- Key, Valdimer Orlando Jr. 1959. "Secular Realignment and the Party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21 (2): 198-210.
- Kopecky', Petr. 2006.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The Nature of Symbiosis."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2 (3): 251-273.
- Mair, Peter. 1997. *Party System Chang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yhew, David R. 2000. "Electoral Realignment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449-474.
- Millard, Frances. 2004. *Elections, Parties, and Representa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NY: Palgrave.
- Miller, Warren E. 1991. "Party Identification, Realignment, and Party Voting: Back to the Bas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2): 557-568.
- Laakso, Markku, and Rein Taagepera.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1): 3-27.
- Lewis, Paul G. 2001. "Introduc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In Paul G. Lewis, ed., *Party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c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p. 1-15. London, UK: Frank Case Press.
- Lipset, S. Martin, and S. Rokkan.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 M. Lipset and S.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1-64. London, UK: The Free Press.
- Lipset, S. Martin. 2001. “Cleavages,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Lauri Karvonen and Stein Kuhnle,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Revisited*, pp. 3-9. London, UK: Routledge.
- Samuels, David J. 2002. “Presidentialized Parti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 (4): 461-483.
- Samuels, David J., and Matthew S. Shugart. 2010. *Presidents, Parties, and Prime Ministers: How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ffects Party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rtori, G.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en, Yu-chung. 2011. “Semi-Presidentialism in Taiwan: A Shadow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eimar Republic.”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7 (1): 135-152.
- Shyu, Huo-yan. 2011.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Freezing of the Party System.” In Liang Fook Lye and Wilhelm Hofmeist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pp. 257-290.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ess.
- Skach, Cindy. 2005. *Borrowing Constitutional Designs: Constitutional Law in Weimar Germany and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tter, Nick. 2002. “Cleavages, Party Strategy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in Europe, East and West.”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3 (3): 425-451.